

22 要培养孩子的平民意识

看家教宝典 寻幸福良方



一个人要真正走向成功,需要具备的优秀品质很多,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很强的平民意识。

我生在农村,长在农村,对父老乡亲有特殊感情。

有一件事至今令我记忆犹新。我10岁那年,商丘一个跟我一样大的孩子随母讨饭到我家,祖母给这母子俩盛了满满两碗饭。那个孩子正在狼吞虎咽的时候,我搞了一个恶作剧——在他的碗里放了一撮土。那个孩子哇哇大哭,祖母看见

后,朝我的屁股上狠狠打了两下,随即把那个孩子碗中的饭倒掉,又给他盛了一碗饭。我从没见过祖母发那么大的脾气,她说:“你怎么这么不懂事,咋能这样对待要饭的?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,对什么人都要看得起,尤其是让人可怜的人!”那一顿饭没见祖母动碗筷,一是祖母生气了,二是锅里没饭了。

那时我年幼无知,不明白祖母为何对要饭的比对自己的孙子还亲,后来我才知道,祖母也到外面要过饭。

从此以后,我再没有觉得自己拥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,开始从内心深处尊重社会底层的人。这种品质让我受益无穷,一旦我们家有事,乡亲们蜂拥而至相助。

受家庭影响,我的一双儿女的脑海里就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观念。孩子回家行李多,有时要找一个三轮车师傅,孩子对师傅特别客气,为了让师傅轻松些,他们不但不坐三轮车,还会自然而然地搭把手,多给的费用也不让人家找零。家里来了农村的亲戚朋友,他们都会笑容可掬地递上一杯热茶。父母不在家时,他们还会主动和客人聊天,把家里所有的水果、小食品拿出来招待客人。

布思·塔金顿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,他的作品《伟大的安伯森》和《爱丽丝·亚当斯》都曾获得了普利策奖。在声名最鼎盛的时期,塔金顿在多种场合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:

在一个红十字会举办的艺术家作品展览会上,我作为特邀嘉宾出席。其间,有两个可爱的十六七岁的女孩来到我面前,虔诚地向我索要签名。“我没带自来水笔,用铅笔可以吗?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她们爽快地答应了。一个女孩将她的非常精致的笔记本递给我,我取出铅笔,写上了几句鼓励的话语,然后签上了我的名字。女孩看过我的签名后,眉头皱了起来,问道:“你不是罗伯特·查波斯啊?”

“不是。”我非常自负地告诉她,“我是布思·塔金顿,《爱丽丝·亚当斯》的作者、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。”小女孩将头转向另一个女孩,耸耸肩说:“玛丽,将你的橡皮借我用用。”

从那以后,我一直告诫自己:无论自己多么出色,都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。

有的家长常这样教育孩子:“记住,我们是贵族阶层,是上流社会的人,不要和那些下层人交往。那些乡

下人愚昧无知、粗俗不堪、不可理喻,和他们接触,你会沾染上俗气的。”

在父母错误观念的影响下,有的孩子数年不愿回一次老家,爷爷奶奶来了,孩子一点儿也不热情,他们从心里瞧不起这些“土老帽”。家里来了老家的客人,孩子从不打招呼,他们看见这些乡下人,觉得不顺眼,认为这些人到家里来是一种麻烦。

这类家长不知道想过没有,我们都是平民出身,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,瞧不起底层人,就是瞧不起自己;对他们不尊重,就是对自己不尊重。

平民阶层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,他们的坚韧、善良和智慧,是那些所谓的贵族阶层所不具备的优秀品质。一个不亲近平民的人,就像一棵根部没有泥土的豆芽,是长不高、长不大的。

培养孩子的平民意识,不仅是品德问题,也是能力问题。亲近平民,是一种人生态度,更是一种人生智慧。一个不具备平民意识的人,不可能具备平民的智慧和毅力,不可能得到平民的认可和拥戴。这样的人就像一棵没有根的植物,不可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。

(摘自《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己》贾容韬 著)

15 救援先遣队的两难抉择

写在汶川地震五周年



这仍然是杨卫东所在侦察队的任务,他们出发时接到的命令就是快速进入汶川。从12日22时在黑夜中冒雨强行军开始,他们已经连续走了十几个小时。杜晓注意到在他和杨卫东交流情况时,侦察队员们倒在地上就睡着了,但他们还得继续前进。

杜晓、张云安和蒋青林强烈要求他们留下,但军令在身,杨卫东无法留下,这三个沮丧的人只好退一

步,希望杨卫东带着侦察队员在镇里“走一圈给大家看看”,以安抚那些恐慌和绝望的民众。即使只是一支22人的小队,也至少能说明映秀镇并不是被遗忘的角落。

这个要求并不过分,这群侦察兵暂时开始执行心理疏导的新任务。他们刚走到秀坪街口,一直在文教楼水吧废墟守着的马洪莉冲过来跪下,抱着杨卫东的腿,乞求侦察队解救她的亲人。他们随同马洪莉来到废墟上,向废墟里面喊话,还能听到回应,但水泥碎块太重,他们没有工具而无法搬动。站在这堆钢筋水泥的怪物面前,杨卫东深感人的渺小。他默默地盯着废墟,恨不得用眼神融化那些钢筋。可是当时他能做的只是安慰马洪莉:“大部队很快就要来了。”

几百米长的秀坪街很快走完了,他们来到西端的派出所。杨卫东觉得“表演”任务已经完成,便稍事休息,准备继续前进。蒋青林默默地递给他一盒牛奶,杨卫东还没来得及接,就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从小学方向走来,在几十米外就对着这群军人跪下,泪流满面,跪行着喊叫:“救救我的孙子啊!”

显然,侦察队已经不可能继续前进了。他们被带到了这个生与死

的中心舞台,没有人能逃避命运安排给自己的新角色。杨卫东被触动了,他暂时搁置军令,把士兵们带到了小学。

他注意到,小学的操场上聚集着很多家长,摆放着十几具学生尸体,大部分没有遮盖,只是用瓦片盖着脸,或用砖块挡着破碎的头。门厅处露出一具女孩的尸体,一条腿在内,一条腿在外——她只差一步就能逃离死亡。杨卫东让士兵们在操场上待命,自己登上废墟。那里已经被挖开,不用观察搜索,他立刻在脚下看到了两个女孩:扎着马尾辫,脸对着脸,安静地躺着,都已经死去。这猝不及防的画面让杨卫东说不出话来,那两条柔软的马尾辫像锥子一样扎着他的心。他猛一挥手,士兵们冲上了废墟。

没有什么工具,有人送来几根当作钢钎使用的粗钢条和一把大锤。大部分士兵只能用手刨,这让他们的指尖很快鲜血淋漓。挖出三具尸体后,在一根大梁和楼板之间,他们听到了一个小女孩在说话。刨挖出一个两米多深的坑后,他们看到她了,同时也看到了一位老师的尸体。他的大腿正好挡在了女孩和洞口之间,身体则被楼板紧紧压着,无法撬动。杨卫东与谭国强商量,

谭国强说:“不行的话,把老师的腿锯掉,先把小孩救出来吧。”

玩命行军、手指流血和面对尸体都不算什么。但是,如果让这些还不到20岁的士兵去锯掉尸体上的一条腿,那可能使他们心理崩溃。杨卫东对谭国强说,最好由“你们的人”来干,并且要征得老师家人的同意,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干这事儿。

雨不停地下,天也黑了,作业无法继续。杨卫东对小女孩说:“小妹妹,不要哭,叔叔到时再来救你。”他不敢说“明天”,那遥远又不可知。在生死一线的环境下,生命只能按一小时一小时来过。

就在杨卫东带领侦察队在小学挖掘时,其他救援先遣队以及过路或寻亲的官员也陆续抵达映秀镇。这些身份各异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:汶川。但是,他们现在会聚到了映秀镇,和杨卫东一样,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。夜晚让他们没有任何办法,也没有任何事可做。他们只是形形色色的“侦察队”,人数稀少,手无寸铁,对于废墟深处的生命救援,和当地居民一样无能为力。

(摘自《汶川地震168小时》张良 著)